

谷牧引进改革开放第一笔外资 曾被母亲骂为“汉奸”

1980年8月26日,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置经济特区,并通过《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》,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。《纽约时报》惊叹:“铁幕拉开了,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。”

“有一位老人,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。”这种关于特区开创的浪漫主义叙事,无疑省略了其中的踟躅与艰辛。30年后的今天,重温“杀出一条血路”的精神,也许更能体味特区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。

“中国开放的操盘者”、“改革开放的开拓者”、“经济特区CEO”,这是国内外媒体给予谷牧的高度评价。他既是毛泽东时代的副总理,也是邓小平时代的副总理,邓小平说他是“明白人”,叶剑英说他是“改革开放的侦察兵”。就是这样一位深谙儒学,恪守理性中庸之道的老人,在历史的关键时刻,受中央委托带领特区杀出了一条经济对外开放的血路。对于特区来说,他既是中央的决策者,也是一线的指挥员。



对话人物:

刘念远(谷牧长子,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某部退休少将)

刘会远(谷牧次子,深圳大学退休教师、区域经济研究所原所长)



▲ 1985年5月,邓小平和谷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商谈工作。(资料图)



▲ 1978年5月2日至6月初,谷牧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考察欧洲五国,图为谷牧一行到法国。(资料图)



▲ 1979年9月,谷牧率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会见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。(资料图)



▲ 1983年,谷牧在汕头考察基础设施建设情况。(资料图)

新中国首次派团访欧,元首争邀“谈经济”

1978年,百废待兴的中国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大门。

5月,从来没有出过国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队,去西欧五国考察访问。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,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。

法国、联邦德国、瑞士、丹麦、比利时……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考察,谷牧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有了实感:“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《政治经济学》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。”“差距太大了,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。”

正是这支“侦察兵”,为开放前夜的中国带来了宝贵的“情报”与决心。

记者:说起特区的草创,可以追溯到谷老的西欧考察之旅,“开眼看世界”拉开序幕。

刘念远:1976年“四人帮”被搞,父亲高兴地喝了将近一瓶的茅台。他一方面感到“庆父已除,国家将兴”,另一方面又感到经历十年浩劫,国民经济千疮百孔,重整河山,任务艰巨。

1978年,父亲带队考察西欧五国。成员中有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,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等六位部长或副部长级干部。临行前,邓小平同志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汇报,指示要“广泛接触,详细调查,深入研究些问题”,什么都看,他们成功的要看,他们失败的也看,看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。

巧合的是,5月11日,“真理标准大讨论”一文见诸报端。第二天,父亲率领的西欧考察队抵达法国。

记者:据说他们此行,接待规格出乎

意料地高?

刘念远:父亲本来以为,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,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。可是所到国家,同他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。法国总统德斯坦、联邦德国总统谢尔、瑞士联邦主席里恰德、比利时国王、丹麦女王都见了。

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,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,听说你们资金困难,我们愿意提供支持,50亿美元怎么样,用不着谈判,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!从丹麦去联邦德国,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说,你要到大国访问了,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。

父亲说,这些国家资金过剩,技术要找市场,产品要找销路,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,做生意。只要我们做好工作,许多事可以办。

坦然“落后二十年”,老师震动支持改革

记者:谷老当年的报告很大胆。

刘念远:他在报告中直言:“我们的上层建筑,很不适应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。我们一个省市,比欧洲一些国家还大,可是省市管理经济的权限却很小,很少主动性,省市在计划财政物资的管理上并没有真正成为一级,许多事情都得跑北京来解决。而且,往往一个问题,跑几个部门,等几个月,还没有结果。”他建议要给有条件的地方“放权”“搞活”,这其实就与经济特区的早期设想不谋而合。

1978年6月下旬,党中央、国务院的许多领导同志听了他的详细汇报。这个会开得时间很长,从下午3点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。叶帅从战略上强调: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,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,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,他们资金过剩,技术需要找市场,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。聂帅态度坚决地说: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,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。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,应当拍板了!不要光议论了!

记者:老师们都支持改革开放啊。

刘念远:我讲一个故事。会后不久,聂荣臻元帅还觉得不过瘾,让父亲到家中详

细介绍出访西欧的情况。

一进门,父亲刚想从公文包里拿出考察报告,聂帅就摆手说:“不用拿了!谷牧,你这个报告写得太好了,我都看了五六遍了!你看,我都用不同颜色的钢笔、铅笔,做了好多记号、眉批。真想到当年留学和工作过的国家走一走,看看他们战后是怎么发展的,可是我八十多岁了,走不动了。现在借你的眼睛,逐个给我介绍法国、德国和比利时的变化。”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晚上9点,聂帅还留父亲在家吃晚饭,言犹未尽。

父亲后来在回忆录中动情地写道:听着叶帅、聂帅、先念等同志发言,我眼前又浮现出1967年所谓“二月逆流”时三老(李富春、李先念、谭震林)四帅(陈毅、叶剑英、聂荣臻、徐向前)艰苦抗争,痛斥江青等人的情景(编者注:当年谷牧和余秋里被诬陷为“二月逆流的小伙计”受到批斗)。时隔11年多,我们终于可以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,痛痛快快地放手工作了。而在这关键的时刻,又正是这些我非常敬重的长辈给了我力量。

访日促成首笔贷款,老母亲责骂“汉奸”

记者:谷牧从日本引进贷款,据说还挨了老母亲的骂?

刘会远:当时,父亲接到了日本对华友好人士传来的信息,说日本政府有一笔向发展中国家贷款的“海外协力基金”,利率极低、搁置时限长,本息偿还期长,中国可以争取使用,但是须由中国先开口。

经过几轮磋商,1979年9月,父亲访问日本。前首相田中角荣说,你们早就应该来了,我们已经等候一段时间。那次访日,父亲促成了为数500亿日元的中日第一笔贷款协议,年利率3%,还款期30年,打破了“不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”的思想禁区,我国迈开了使用国外贷款的步伐。

父亲这代人的家国观念很强,为了国家长远利益,个人的历史恩怨都可以放一边。他首次访问日本之前,我奶奶很不解:“你去那个地方干啥?”因为当年侵华日军

不仅在我们家乡烧杀掠夺,而且还差点要了父亲的命。1941年父亲在沂蒙山区与侵华日军殊死搏斗时,在右胸留下了日本人的弹孔。所以我奶奶后来在电视里看到父亲签约场面,拿拐棍敲着地板说:“汉奸,汉奸。”

父亲后来与六任日本首相都成了朋友,跟新加坡资政李光耀也是老朋友。去新加坡访问时,他送给李光耀一方镌刻着一章《论语》的鲁砚。李光耀风趣地说:中国有句古语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,新加坡没那么大,一章就够了。后来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受父亲邀请当了中国经济顾问,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“外脑”。

(摘自自《南方日报》)